

野百合通訊

第四期



目錄

<學運反省>

校園、學生自治與運動	羅雅美1
有關東吳313事件抗爭過程的反省	江仁傑4

<多重戰場——暑期營隊報導>

客家學生聯盟——東勢客家營	張高傑6
群眾雜誌——社會改造先鋒營	徐文彥7
勞工陣線——學生幹部研習營	韓仕賢8
台權會——人權訓練營	吳冠良9
中央中原聯合環保訪調營	10

<音樂屠場> 「自己幹」筆記	12
----------------	----

<流彈四射>

自殺的喪禮	陳政亮17
關於新黨的一些思考	葛東西21
划向自治之孤舟——雅美族行動的啟示	戴伯芬23

<爽與不爽>

關於一本學運史新書和一場未竟的討論	周奕成28
有人開了一間帽子店	侯念祖30

1992年11月12日創刊 • 1993年9月21日本期出刊

編輯委員：王時思 史哲 何東洪 沈發惠 林致平 邱花妹 邱毓斌
周奕成 侯念祖 郭紀舟 陳尚志 陳政亮 黃泰山 黃新高 楊添圍
劉茂彬 蔡其昌 蕭武昌 夏樂祥 林淑貞 韓仕賢 石德隆 林宜瑾
劉思龍 陳俊麟 丁勇言 吳冠良

本期美編：陳俊麟等人

聯絡地址：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25巷2弄28號

TEL / FAX：(04)6321740

郵撥帳號：21190523 劉茂彬

贊助訂價：六十元以上

校園、學生自治與運動

羅雅美

從1991年五月獨台案以來，我們一些還願意自稱是「學運圈」的朋友們渡過了難堪而又困惑的兩年，兩年後的「五一六重建新大學遊行」，不到一百個夾雜新舊臉孔的學生，走在五月豔陽天下，卻有著彼此都不太願意去面對的淒冷之感。

相應著七年前因同樣議題而結合的學運第一次跨校際組織「大革會」，七年學運史，大起大落，似乎在應驗著這樣的說法。學運是個大黑洞、填塞的只有意識型態，而黑洞是沒有出路的。於是在幾次的聚會、座談會、校際會議中，談話總由三月學運而起，以沒有結論的無言嘆息而終，有人仍津津樂道於三月的波瀾壯闊，有人則仍苦思校園經營的困境，依舊茫然而無力。而我們當然還相信彼此對社會改造的堅持，只是在服膺的理論教條中對弱勢的關懷對體制的挑戰似乎只能連結於每次的運動動員下，回到校園一意識型態的四方圍牆中，學運份子卻在自己的戰場失去了戰場，在群眾之所在失去了群眾。

當然，有些朋友則早已在校園找到一可能的施力點——拿下學生會「執政」，而我們學運圈的朋友則不知從何時開始認真關切起這條出路的可能性，在幾次學生會的實踐檢討中，大家開始討論：如何以有限的社團人力撐起一個龐大的學生政府？如何避免自身掉入官僚作風中？進入體制的運作邏輯之中是否造成“必然的墮落”？學運在追求執政的過程是否終將失

去其原有的理想性及批判性？這樣的討論總是令人感到艱辛而吃力，隱約的似乎學生會被視為一階段性的，議題的試驗而非將其作為一條校園的實踐路線在思考，在此，我們希望能將問題還原至最原始的起點：我們究竟是以什麼樣的立場看待校園經營而在實踐上扣連上學生會，而如“執政”成立為一條路線，我們將如何循此路線交叉挺進建立校園基地？

三年前的三月學運學生們在撤退廣場時，信誓將野百合的精神帶回各校落地生根，曾經在運動浪潮上，學生走出校園，熱血澎湃於每個街頭的嘶聲吶喊中，我們在一波運動中分析政治情勢，評估聯合的對象，打擊的目標，及如何掌握現實條件以有效的策略達成目的，累積資源，一旦走向校園，這樣的思考一樣也不容逃避。如果我們都清楚校園連帶於整體資本主義的機制，其作為一意識型態再生產的場域，學運在此要開展的將是一場綿長而又細緻的意識型態的鬥爭，而在此戰場中，我們面臨的條件，限制為何？可以聯合誰打擊誰？我們如何讓每一場運動中標高的理念得以落實累積？我們要打造怎樣的大學樣態？在早期的學運發展，反抗反覆於對中通，國思、軍訓課程的批判，對軍訓教官，審稿制度，特別權力的挑戰，挾帶著犀利批判的武器，學運社團遊擊於每次可被動員的議題中，然而這樣不斷批判的作法雖為保持校園言論突破了一個缺口，

也使學運塑造了一定的理想性及正當性，欲陷入無法開展具體的實踐路線以累積運動成果的瓶頸。

1987年，台大爆發普選運動，各校在學生自治這個層面開始將思考轉移至如何顛覆或改造長久存在的學生傀儡政府，雖然此時學生政府運動化的思考仍十分模糊。1989在全島成立學生會聲浪高漲下，東海校方率先成立學生會，由國民黨學生搶下第一屆任期，扛著學生自治新紀元的旗幟換湯不換藥地運作起來，透過選舉的機制，“學生會”作為整體的學生代表取得無可比擬的制高點及正當性，當然，如果這個戰場為校方取得，便成為最好粉飾太平的工具，最好鎮壓異議聲音的打手，而如學運社團仍停留在組訓幹部，議題動員及對現狀進行不斷批判的格局，則必須開始現實地面臨到運動資源成果為更具正當性的學生會所搶奪吸納的問題，而如我們仍堅持意識型態鬥爭為我們校園工作的重心，則更不能漠視學生會這樣具有龐大資源，高度正當性的戰略高地淪為特別權力關係下的傀儡或另一反動勢力的凝聚所在。而幾年來，我們不斷論述著組織群眾，經營校園，而校園選舉作為一場運動，角逐著不同的勢力及意識，激化所有的矛盾及議題，正為群眾之所在，意識型態鬥爭之不可逃避的戰場，如何在選舉機制下帶入我們要的論述，動員起群眾更是作為一運動主體最具體實踐檢證的機會，

有人質疑學運作為一支顛覆既有體制的勁旅具有高度的理想性，如果搶奪學生會是否會為體制所吸納且失卻其原有應做的反對工作，而思考也恰好正應在此釐清，以學生會作為一戰略位置及組織拓展的場域其一重要的前提正是須有強有力的體制外運動作其後盾以扭轉既有體制內運作的邏輯，相當清楚的，在校方特別權力的宰割下，學生政府一向是無力且無立場的，而欲突破此一階上的困境則必須運動性的來經營此一戰場，並有一體制外的部隊交叉前進，即原有的社團組織運作，而如我們思考學生會作為一條路線其在現實條件上是有實踐意義的評估，是具有立場性的，則應有的反對工作則應是透過人的能動跨出既有的格局，以行動形成批判的內容。過往我們高舉意識型態的旗幟，我們要求學生自治，校園民主，我們追求校園的草根實踐，我們也毫不留情批評以往學生政府被閹割的體質，今日戰場開闢在眼前，我們便要捲袖上陣，畢竟歷史是留給行動者的，而他們說：通往天堂路總是踩著地獄的花朵在前進……。

餘留許多技術層面的問題，則答案將有無限。可能，如我們在學生會的運作邏輯下可以做些什麼有別於既有的事，則談草根民主，宿舍自治委員社區自治委員會，就該開創，談社會關懷，則社會講座可被開闢，如我們要展開一場運動，對抗主流的意識型態，則將以此一基地為號召

有關東吳313事件抗爭過程的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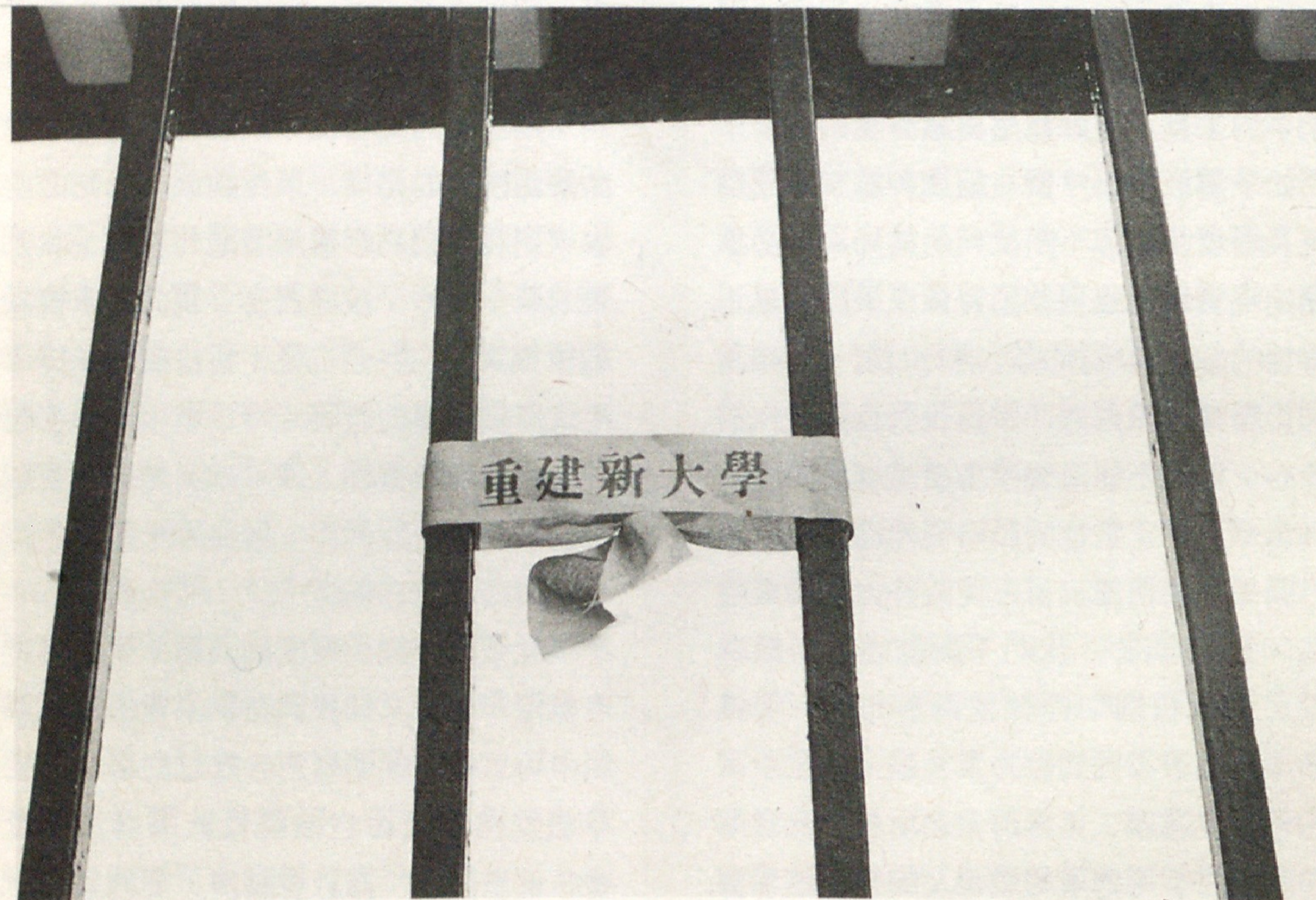
江仁傑

為資源累積之所在，所有我們理想的企圖在我們親身親手下被一點一滴的重塑，而這本是我們在高舉理想之初，在批判之始即已負有的責任。

當然，站在高處正為群眾直指之處，挑戰及質疑將如千軍萬馬而來，而必然的，格局愈大，工作也愈重，然這不該是逃逸的理由，歷史的進程早已一步一步在檢驗著，人的能動，而同志，除非我們不清楚我們堅持的是什麼，除非我們對所堅持的正當性失去信心，否則不要告訴我那

未知卻「可能」墮落，因為畏懼才是最大的墮落。

我們還有一群仍願意有稱是「學運圈」的朋友在意識型態的四方圍牆裡奮鬥，看清現實，我們不期待在時空配合，因緣際會下的情勢再創學運的浪潮，也不等待校園在社會解放的同時被自然地改造，在青春奔馳的四年，我們便要一代一代改造校園成為解放這個社會的一股最中堅的力量。



在重建新大學的過程中，學生會一直具有運動／執政迷思的縮影

台灣的大學生中30%是公立大學的學生，70%就讀於私立大學，但是教育資源的分配卻極不平均，公立大專院校學生一人一年所分配到的教育預算經費是30萬台幣，而私立大專院校學生卻只有1萬5仟左右。自從政府公佈將再設置23所大學之後，更令人看出政府在大學政策上的取向，寧願將教育經費用在設置新的大學，也不肯補救高學費、低教學品質的私立大學。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私立大學學雜費不斷調高，而教學品質卻未見改進，像是對聯考分數不高的學生報復一樣，「私大學店化」在教育政策之下已成定局。

針對種種私校特殊的不合理現象，上學期在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皆因學雜費問題而爆發針對校方的抗爭。以東吳大學為例，今年3月13日東吳大學校慶，同時新大樓落成典禮當天，東吳「蘇菲亞社」於校慶開幕典禮時衝到觀禮台旁拉布條靜坐，散發傳單並發表演說，抗議(1)校方違法超收學費，(2)代校長章孝慈資格不符，以及(3)草率決定政商要人之名來命名新大樓各廳堂。

「校方違法超收學費」這項訴求所抗議的，是教育部所規定的彈性收費標準，東吳校方並不遵守，屬於法令上的「技術性」問題彈性收費標準分成三個階段，學生與專任教師比例達到20:1才可收第三階段標準的最高學費，先姑且不論彈性收費標準本身，對於專任教師的認定過分寬

鬆，但就算寬鬆的標準，還是讓私立大學感到「難以遵守」。東吳大學距離20:1標準尚遠，相差100多位專任教師，卻連續兩學期超收學費。第一學期超收學費遭媒體露，教育部起先嚴厲警告，後來卻不了了之，使得第二學期超收情況仍未改進，再加上代校長章孝慈資格不符的老問題（未取得教授資格在外兼職老K的國代皆違法），還有新建大樓的各廳堂命名為霖澤廳（蔡萬霖的恩澤）、傳賢堂（戴傳賢為蔣緯國生父）、新光廳（吳東進）、舜文廳（吳舜文）……，東吳校方種種開店，毫無「學術尊嚴」及赤裸裸官商勾結抱人大腿的惡行惡狀，已經到罄竹難書的地步，台灣的私立大學弊端在東吳大學有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現。而313校慶事件的抗爭等於是新舊問題的總爆發。

東吳學運在「獨台會案」之後的所謂「學運低迷期」遭逢斷層，當然除了客觀環境因素之外也摻雜學運社團本身的問題，校內學運社團的組織（社團）並未能故做好傳承，釐清路線，平時組訓等等，以致於1993年313抗爭一起，便暴露出「蘇菲亞社」經驗不足的情況，例如當校方決定將「蘇菲亞社」其中4名社員記過或退學處分時，社團決定在校內靜坐抗議，此一決策「擦槍走火」的性質頗高，許多社員在未及充分討論情況下投入活動，準備不足，以致於靜坐三更之後於5月5日召開說明會，雖取得校方部分承

別在交大、師大、東海開了三次籌備會，對於營隊的定位及其意義、各社團目前的需求、課程內容做了充分的討論，此次生活營於焉誕生。

透過東勢介紹、田野訪談、客家之夜以與東勢居民有良好的互動。因為在本土意識蔚為風潮的今天，多人卻未能從最起始的生產者及其所賴以生產的勞力、土地開始認識、再逐漸擴大累積，造成許多的判斷及信仰缺乏血肉肌理，停留在貧乏游移的階段。故有這樣與客家庄接觸、互動的設計，把課堂講授的內容在田野之中重新體驗。

群眾雜誌 — 社會改造先鋒營

徐文彥

由群眾雜誌社所舉辦的「社會改造先鋒營」於六月二十六日起在宜蘭縣礁溪鄉舉行，為期四天三夜，共有來自全台灣各大學之學運社團約四十餘名大學生參加。

群眾雜誌一向標舉「為工農小市民翻身戰鬥」的鮮明立場，對國民黨與台灣的資本主義體制也始終積極地挑戰與批判。平時除了編輯出版雜誌外，他們也會主動的介入社團及各種抗爭場合之中，甚至每月不斷地深入台灣各角落舉辦演講會，以

課堂所講授的內容則以對客家知識份子、族群關係、客庄都市化等問題的反省為主，配以上述對東勢客家社會的親身體驗，希望經由這種方式使參與者對客家面臨的困境能有整體而深入的理解，並進一步回到學校社團、自己家鄉實際從事關懷本土的工作。

藉著這個營隊，使來自各地關心客家問題的學生一起生活、上課、討論、工作、聊天……，這樣共同的經驗，有利於未來大家的合作、共事，則是此聯合生活營另一更深層的意義。

主動深入群眾的方式，去了解群眾、認識社會問題之所在，進而達到影響群眾、教育群眾的目的。

基於這樣的立場，「社會改造先鋒營」在他們的設計下，也表現了一些其他營隊所沒有的特色，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實務能力的訓練，包括辯論、演講、掃街喊話等能力的培養和鍛鍊。

營隊的重頭戲是第三天晚上的演講會，在礁溪鄉的帝君廟舉行。而演講會的

內容主辦單位不提供任何資訊或介紹，完全必須由學員自行發掘整理出當地的問題及居民們所關心的話題，其方式是透過前一晚的聯歡晚會中與當地居民訪談之所得做為演講素材，並用一個上午的時間進行演講訓練，包括內容與技巧的修正。下午則由學員分批赴宜蘭各地為演講會做掃街宣傳。晚上的演講會由所有學員包辦演講、戲劇及歌唱表演等所有節目。最令人吃驚的是，大部分的學員都是從未有過上台演講的經驗，在訓練的過程中表現不是很好，但一旦站上演講台，除了偶爾因台語不流利而吃螺絲外，都表現得可圈可點，與訓練時之表現有天壤之別，不知是學員們的潛力雄厚呢？還是壓力可使人有明顯的進步？

其實這樣的訓練對每個運動者來說都是必須的。真理要接受實踐的檢證；我們的思想也該和他人相互交流激盪，要能經

得起現實的考驗。在面對群眾時，我們必須了解群眾的問題與需要，並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運動他們，這些能力的培養就是舉辦「社會改造先鋒營」的目的。現在，我們的身份是學生，校園作為我們的主戰場，校園群眾作為我們主要的運動對象；而將來，我們可能置身於不同的戰場，面對不同的群眾。自許為改造社會，謀求人類解放的運動者，我們是該嚴肅地面對自己，不妨給自己一些壓力，去激發自己的潛能。畢竟社會改造的理想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在現階段的校園工作中，我們應深入了解校園群眾的想法及需要，放下身段，主動的去幫助解決他們的問題，並進而運動他們、改造他們，逐步壯大我們的運動規模，強化我們的運動內容，並擴大我們的影響力，這該是我們從「社會改造先鋒營」中所得到的寶貴經驗吧！

勞工陣線 — 學生幹部研習營

韓仕賢

台灣勞工陣線在這個暑假，舉辦兩個梯次的學生營隊，期使大學生能夠有機會接觸，認識到近年來自主發展的勞工運動。第一梯隊在6月28日至7月1日，於烏

來迷你谷舉辦；因為招生的對象是以曾經參與勞工營隊者，社團舉薦的幹部為主，所以在課程的設計上，旨在深化勞陣對社團組織經營，發展技巧，及發掘有志於社

會民主改造者。

這次營隊的課程設計有幾個特點：(一)課程的規劃與內容，先由勞陣擬妥範圍，再由學員討論決定；如此學員有參與課程安排的機會，也考驗主辦單位的應變能力。(二)每節課的討論大綱與重點均寫成大字報，並張貼於教室，提供學員在以後的課程討論參考之用。(三)學員與工作人員有充分的互動，尤其在頗具啟發意識的團體動力遊戲，不僅學員有所成長交流，工作人員也可從中獲取經驗。(四)以職災受害者的個案為教材，並請當事人現身說法，除了讓學員感受一個勞工家庭生活無奈的一面，也傳達勞工堅持抗爭的信念與意識。

不過，這次營隊的整個過程，也暴露一些缺失。原先40餘名學生報名，且包括

東海、台大之外的其他學校社團，可惜實際參加學員僅有東海、台大等學校社團，無法達到校際交流的目的；另外，安排社團／學員之間的聯誼活動，因時間受限略嫌不足。其次，勞陣以工運團體的角色，安排如何經營學運社團及突破困境的討論，難免會有找不到問題根源的限制；或許可以邀請曾經參與學運的重要幹部，以座談的方式謀取改善。

整體而言，勞陣舉辦學生營，其目的是希望藉由營隊做為與學生溝通，討論的橋樑，進而發掘對台灣工運持續關注的學生。當然，工運團體與學生的接觸，尚包括其他管道，最重要的是長期經營的效果，畢竟學生「關懷弱勢」的「決心」仍有待考驗。

台權會——人權訓練營

吳冠良

台權會的營隊，從7月5日到8日，在美濃舉行。招收對象為高中、大專以上的學生，共19個學員參加。

此次營隊報名的學生多為未實際參與運動操作的同學，但也有少數幾個學運社團的學生報名，如東海人間工作坊、逢甲論壇。因此，營隊的課程設計著重在啓

蒙，讓參加的學員對種種議題能有初步的了解。

在課程安排上，仍以幾個基本人權議題為主，如校園人權、勞動人權等。在課程進行中，由講師設計幾個問題，從生活經驗出發，引導學員進行思考，試圖讓學員從自己的生活領域中發現種種不合理的

現象，並在分組討論時，由各組帶組員帶領學員進一步思考如何去反抗現已存在於我們身旁的壓迫，刺激學員去反省到，不起來反抗，壓迫永遠存在。

由於此次營隊舉辦的地點是在美濃，特別利用一天的時間帶學員到美濃水庫預定地勘查，並與美濃愛鄉協進會進行座談，進一步去了解美濃水庫的利害關係及

美濃人反對此水庫地點的動機與組織動員方式。一個地方性的議題，牽涉到的不只是當地的人文、自然景觀遭到破壞，更與臺灣石化工業的發展有關。

台權會的營隊成效仍有待評估，但對一個社運團體而言，能夠遠離中央，到地方去接近群眾，可能比積極地往政治部門發展的方式更好。

中原中央聯合環保訪調營

生活在這樣處處受污染迫害的社會，惡劣的環境，已是我們無法避免去面對的問題。然而，環保教育的不足，使得台灣的學生無法真正了解到環境保護對人類永續生存的重要性，因而引發了我們舉辦環保訪調查。

此次由中央大學福爾摩沙社，環境生命社及中原大學民間校園工作室聯合舉辦的環保訪調營。於六月二十八日於中央大學展開。參加的人員為兩校對環保問題有興趣的學生。而為了能使參加的學員們親身去了解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我們亦安排了桃園地區沿海鄉鎮的污染訪調。故此次營隊可大略分為兩部份：靜態的課程及動態的訪調。以下就此二部分介紹之。

由於過分強調經濟成長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經濟成長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因此，環保意識的建立，對於目前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的人是迫切需要的。此次營隊課程的設計，便是希望能透過一些討論，來加強我們的環保概念。我們安排了(1)生態主張與環境權——以生態為中心來思考自然生態環境與人類之間的平衡關係(2)環保影片欣賞與解析——從影片中所呈現的環保影像觸發對環保的思考(3)台灣環保運動的發展——了解台灣的環保運動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狀態下開始發展及其歷史(4)肢體遊戲——從肢體的解放中熟悉戲劇與環保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5)環保的哲學思考——在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間，找出

環保運動思考性規範意涵及哲學性的探討
(6)公害問題及其對人體的傷害，了解何謂公害及探討對人體所可能造成的影響(7)校園環保與日常環保作法——如何將環保理念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並在校園內拓展環保議題。而課程進行方式着重於討論，讓每個人的想法皆能提出來作一番激盪。

由於中央中原皆位於於桃園地區，基於“大學社區”的理念，我們亦安排了桃園沿海血鄉鎮的污染訪調。我們訪調的範圍包括了：

(1)大園工業區：由於大園工業區屬於特殊工業區，因此其污染也非常嚴重。長期以來所造成的水污染及空氣污染使得其旁居住的居民怨聲載道。然而一開始決策的錯誤及環保單位的無能使得問題更形嚴重。

(2)保障村垃圾問題：由於私人土地租予業者抽挖砂石而後回填垃圾，使得保障林村每天生活在垃圾的惡臭及大卡車的威脅之下。終於在忍無可忍之下由村民們自動發起了抗爭，為保衛自己的村里而動員。

(3)林口發電廠不明公害：林口發電廠設立之後，由於其所排放之煙塵，造成沿海地區防風林枯死並使得稻作只能一穫。然而“專家們”的調查，認為林口發電廠並無污染，至於那些污染現象，只能稱之為“不明公害”。

(4)中正機場噪音問題：由於航道下有不少居民，因此飛機的噪音影響居民的生活甚鉅。如：飛機飛過時不得不停止談話，聽力大減，母雞不會下蛋……等。而中正機場仍未能提出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訪調過程中，不但讓我們實地了解污染地區居民的切身感受，更讓我們了解行政官僚的無能及決策錯誤所帶來嚴重的後果。

儘管由於籌備過程的充促及經驗的不足，無法使營隊進行的非常順利，然而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營隊，能建立起我們對環境保護更進一步的認知，更深一層的思考。我們選擇了訪調的形式，不僅是對環境保護的一種實踐，更是建立“大學社區”——大學與其所在環境所發展出來之共同社區意識——理念的最佳方法。藉着理論與實際的交融深化環境保護的意識，為台灣的環境保護盡一份微薄的心力。

PS. 在文章完成之時，保障村剛剛結束他們一個多月的抗爭而大園工業區內因為大同電纜工廠排放揮發性液體而引發內海村民圍廠抗爭。壓迫正在進行，抗爭亦應如是……。

Do it yourself曾是七〇年代英美另類音樂所揭櫫的大旗。其所反對的，正是七〇年代搖滾樂日益商品化、音樂體育館化（指超大型演唱）。使得年青人玩音樂不是要有高深的技巧，要不就是必須接受音樂工業的諸多扭曲。因此，DIY不但成爲一種反叛精神，更是對玩音樂的一種再認識。

Black Bird在香港一直是Die Hard派。

此次所轉載的，正是陳述他們的音樂創作理念的文章。玩音樂的朋友不可不看；不玩音樂的朋友，這篇文章正好可以做爲欣賞音樂背後的精神指標。

何東洪

「自己幹」 筆記

Note on Diy

Lenny

爲什麼要「自己幹」？

因爲要獨立、自主！

獨立自什麼？

客觀環境的操控。

什麼客觀環境？



一個支配性的文化生產、傳播、再生產。

換句話說……

「自己幹」(DIY: DO-it-Your self) 是由力行者掙求創造及維持一個本來並不存在的空間，顛覆支配，達求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自己幹」的目標是獨立自主。而獨立自主的第一個橋頭堡就是思考的獨立；那首先應是自己思想上革命(Revolution Inside the Head)。不要隨便扣襟章，入黨入社；如果那些立場（情操）、見

解（意念）、綱領（格調）不是你經過自己的思考（即使仍可能有錯）而成立的，你既不獨立、也難自主。

「自己幹」更教育自我。它提昇每個人成爲更好的聆聽者、欣賞者。它更令我們明白寬容異見、接受其他不同個體的重要。

「自己幹」是最佳的「實踐作範例」(Propaganda by deed)，它同時是

感染性(infectious)的催化(catalytic)行爲。

「自己幹」是相對於「凡事以金錢解決問題」和「凡事以效率及效益爲基礎」的資本者心態。「自己幹」於是叛離現代社會對經濟系統的依賴，以維修對衝了浪費，再造資源，迴充人的能量和精神！

「自己幹」強調直接溝通。它贊成直接接觸多於不必要的委託的傳訊。它解拆並拒絕中間人(Gobetween)及傳訊者(Messengers)的無可避免的主觀渲染和過濾(hifo-dyc / filtrc)。它透視到很多不必要(或刻意的)間接傳訊很多時候是製造人際疏離多於了解；是建立分最多於融洽。

「自己幹」不應被誤爲把每個人閉封於一個人的洞天裡。「自己幹」由自我開始，但不自我孤立。它強調互助(Mutual Aid)。因爲「自己幹」並不意謂把所有的事務都背負上身，而只是去做所有自己能做的(包括明白超荷的危機)。於是「自己幹」要達成的，是一個以其特質而言的創造的個體的對外(out-front)的獨立和自立。一個人應當獨立思考所有他認識的問題，但不該在無知的領域(例如電子物理、醫學生理)自持不接受別人的幫助。

這些參考及依循並不破損其獨立性。「獨立」與「互助」並不相拒而和容。

「自己幹」同時向社群謀求協力(沒有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事物和能力上均是自足的)，而聯成小群體。但這小群體是以最簡約的結構存在的。而每一種資源的提供，不論屬經濟、物料、或技術服務，都必須以所協助的活動/創作的獨立自主性爲考慮基礎，不能予以影響或相背抗。我們不應單滿足於「藝術(創造)決策上」的獨立，更應考慮這獨立決策的置境(Situational Context)性質：不單因爲人家讓你怎樣做而接受，應考慮人家把你放在一個怎樣的空間讓你這樣去做。

「自己幹」是民衆的自我解放(Self-emancipation)的開始。它既然由民衆自己開始，也就沒有必要寄情制序(heirarchy)的「文化」殿堂。最悲哀的是由民衆而來，爲民衆面做的、卻不能根紮在民衆之間，而臻昇爲另一個體系(istituzione)，不爲民衆所熱衷和支持。這樣的範例在文化運動中屢見不鮮。

「自己幹」並不表示傾向於次質(Sub-standard)，尤其在意念及思考上；而是避免因追尋表面(外象包裝，器材媒體)上的優質而浪費了、誤引了創造

本體應有的關切。但我們應該正視，由於大衆長時間地接收精緻的商業成品，已愈愈難耐過度次質的創造——當然這是絕不公平的！相反地，倘若獨立的創造以商品同樣的精緻形格出現，它亦失去其獨特的性質；它變成只是衆云商品中的另一選擇。

「自己幹」的一個重要衡點就是在自我掌握的條件下創造出足以產生持久影響力而同時不過度秀異的真璞作品。

微型科技的發展是愈來愈對「自己幹」有利的。當個體的創造/通訊活動能廣泛地繁展開來，由國家和資本機器支配的「大衆活動」就自動解體，並失去其操控性。

對於「自動人工」(artificial antomation)，「自己幹」並非全盤的反對。倘若機械化的自動人工支援整體全面的獨立自主性質(相對於外圍的支配性)，它們是應該被任用的。例如，若你不能負擔一個錄音室製作的真鼓聲軌，而因此要接受一紙合約，就該用鼓機繼續獨立工作。當然，這個鼓聲另一方面又其實支配了作品的特質；於是，我們該將考慮的焦點放在：「鼓聲對作品的完整Vs合約對作品的完整」上。

相對地，倘若科技是在削減創作的自主性(依賴機器多於自己)，就應當迴避。如果你能彈得可以接受的rock吉他，自己來，不應用synthesizer爲你仿效一個rock吉他手！但倘若你彈不來，也負擔不起請樂手，並因此而不能獨立製作自己的音樂，尙然，合成器幫助你實現了自主性。

「自己幹」的一個危險的陷阱是將它浪漫化、簡易化：「每一個人都可創造！」我們應當強調：每個人都可以開始去幹，但那絕不是一個「直銷/即食的便當式」過程。我們應強調開始之後的要求和投入。沒有成長，默守如故的「自己幹」亦是沒有希望的，只有不斷挺進的過程才最珍貴。也只有能維持(sustainable)的「自己幹」才是實在(valid)的。那些在「國際獨立榜上」的百萬組合不少確由獨立自主的性質開始，但他們大部份終歸變成「支薪藝人」，只是銀碼超大，而且不必見老細其臉吧了。即使「精神上」他們如何「獨立」，音響上他們如何具備那標誌色彩的「獨立聲」，他們再不如當初設身的置境般，由自己面對、處理所有的問題；承擔令自己的創作變成現實的所有責任和過程；他們已有一個龐大的工業機器

在背後為他們運作，只要曲目仍有市場(as long as they are of market-value)。

「自己幹」的另一危險陷阱，是忘掉了自身的本質和條件，開始就誤把具豐裕資源的商業精緻文化拿來作為量度自己成的準尺，於是陷入羞愧和害躁，失去工作下去的自信和勇氣，最終一無所成。能清楚明白在一定制限下的可能和可行性，是相當重要的。

「自己幹」並不反對「受廣泛歡迎」(Popularity)，但反對「造就」出來的歡迎度(Manufactured popularity)。這正是市場經濟的毒瘤（我們當然贊成不是花了錢就必然有成果）。如果「自己幹」能以自己的條件和原則“make-it”，得到廣泛的肯定和支持，那才是真正的成就。依賴投資而製造的「受歡迎」程度，很大可能與創造本身毫不相干。

「自己幹」並非鼓勵低調，反之認為應盡一切非支配性的渠道將創作、活動的訊息廣泛地流傳開去。因為只有愈多人接觸得到這樣的創作，它之相對於「文化」工業出品才愈有意義。所以「自己幹」並不閉關自守，反且擾躍出界。只是不受金錢／權力指策。

其實只有透過「自己幹」，文化才有希望，因為文化的建立並不在於一兩個天才，兩個偉大的「藝術家」……文化的出

現是因為有一個熱中於該種創造活動的社群，而且這些活動躍活在很廣闊的不層次（忘記疏離性的職業／業餘的類分標貼）。如果我們說：香港有一個蓬勃的另途音樂文化，我們應該是說：香港有一個蓬勃的音樂創作社群，不單對事物具另途的觀見，更能創作出另途格調的音樂，並利用另途（非支配性獨立自主）的方式流通面存在，而不只是香港有些組合用類似人家標訂的「獨立聲格」唱些老套常談的話，而且和商業音樂工業一模一樣的運作。

否則，另途音樂這「文化」，只是一個病態社會備用的諸種調劑飾彩中（比較不受用）之一。

自己幹！但幹什麼？這是沒有人可以代替回答的問題，得由那個「自己」探索。而且有時候，找到了幹的手段，掌握了幹的技才，還得面對最終的挑戰；幹的內容（自己的思考）。

很多時候，不少人並非無能自主獨立，而是他們不願。他們不願面對自己，超越自己，因為那不單需要勇氣，還要求努力。現實不是一方面告訴大家「個人的力量太小了」，就是用娛樂及物質把大家「咕筭」(cushion)得舒舒服服。而依靠(Dependence)扼殺希望，因為它誘發支配(Domination)，而支配無天下界。

轉載自「黑鳥通訊」第柒期

流彈四射

自殺的喪禮

陳政亮

如果我還有勇氣回憶過去的日子，並且能帶有一點點「批判」的味道，希望我還能呈現過去而尚未逝去的幽靈，為這些運動的記憶填起一座小小的墳，舉行送喪儀式，並在每年上香的時候想起舊有的一切。

高中是天真的自由主義的世界，在那裡，國家社會的問題就是制度的問題，就是政治的腐敗，而我的滿腔熱血要被那黨外的、李敖的、柏楊的文字所激盪。搞不清楚左右是什麼的時候，我所援引來對抗不滿的刀槍，竟是隱含在教育內容裡、已經被國民黨扭曲的自由主義精神。那些舊有的政治犯傳奇、知識份子的傲骨、略帶興奮刺激的台獨的主張、以及「民主、自由」的口號，毫不經意的連結在一起。但是個人主義的我，只想單槍匹馬的在週記上、作文裡透露一絲的異議、「社團」、「組織」對我來說不如下課偷抽香煙來得具體與實在。

但是我是講義氣的「兄弟」，交雜著神聖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豪情壯志與兄弟的慷慨激昂論天下大事；我不要別人管理，我就是自己的主人，國民黨、教官、訓導人員以及腐敗的三民主義課程，就是三合一敵人！我的世界如同西部電影裡只存在俠客與盜匪一般，只有上帝與撒旦，真理與邪惡的區分。

承擔著自己的過去，在大學學運社團裡，我要學的東西還很多呢！最驚心動魄

的就是「鬥爭」這個詞兒。「鬥爭」好像被用來代替「辯論」，並且這個詞好像有不理性的味道。於是我自己為了這個詞日思夜想，為了替它找一個正當性。我想它的意義大概是說：歷史進步的因子通常是衝突；沒有以理服人，只有以力服人；如果你今天不這樣鬥爭，別人卻正在鬥你，那我們該放棄理想嗎？所以「鬥爭」是對的，或是不得不然，或只是一種手段，或……；所以我們要搶「資源」，累積「資源」，該狠的時候要狠，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所以我們要先劃清戰線，要問：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聯合誰，打擊誰；所以我們要問，誰是什麼派系的，他有何目的，想得到什麼；所以我們不能溫情，不能無視於組織的決議。

並且我還記得許多的運動是在這樣的評估之下進行的：我將許多不同的，在某一議題的運動中將會出現的特定人物，給予一定的數字，正數代表著贊成，負數代表著反對，數字的大小代表著力量的多寡，然後我加加減減的算計，並以此來評估該聯合誰，或是反對誰；於是「資源」成了數字，活生生的、具有感情的人化成了加減乘除的簡單代數，而單位的運作規則正如同棋盤底下的棋子：象是永遠走著田，而馬則永遠走著日。

我其實也困惑，要不要用這樣的思考方式來面對團體內與運動圈的朋友們，然而周遭的人根本不是如同數字一般的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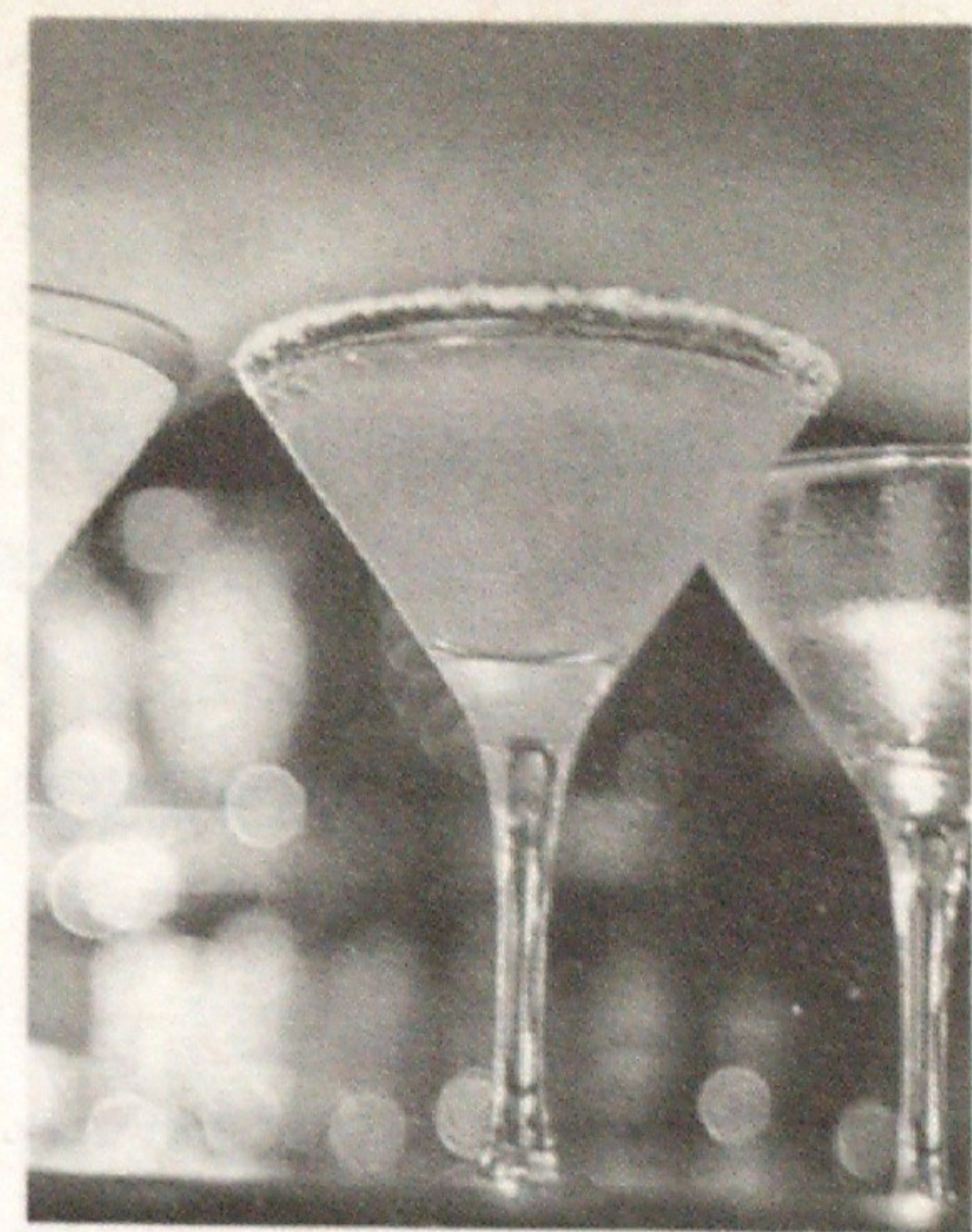
著；我又疑惑著，在與這些南北朋友交談時，總是少見年少的簡單、豪爽與至誠，卻多是複雜甚或死硬的面容；我模糊的感受到我的運動圈朋友們，其實也受著與我相類的困惑，但是我的感覺卻又只是永無止境的猜測與算計，我們的交往又總是帶著令人不堪的尷尬，在我腦中僅剩的，只有到處飄盪的謠言。

而在尷尬與謠言中所進行著的運動，多少有人看不慣而說話，他〔她〕們不斷的提醒我們：這就是沒有學運路線的，缺乏意識型態的鬥爭，只是人際關係的派系遊戲；她們一直在口中唸唸有詞說：那是你們父權的邏輯；他〔她〕們迫不及待的在我們的耳邊嚷嚷道：這就是政客的玩意！

或許這真的是問題的解答，或許這本身也是派系的傾軋；我卻陷在霧裡看花，看不懂自己所演出這個動亂的時代戲碼，但是來不及冷靜的尋找答案了，台詞已經寫好了，忽然湧現的劇本清楚的要求我表明：表情憤怒！言詞激動！迅速回擊！

馬克思尚未照亮這個難解的死結，我所擁有的像極了高中時代的僵硬腦袋。這個不是同志就是敵人，不是對立就是統一的律則，看起來像是鋼鐵所鍛造般的堅定，冰冷死寂的鐵的桎梏，鎖住變動中的我們的烈火。

幸與不幸，那些因無所反省而保存著舊日的「兄弟」風格，喝酒才見的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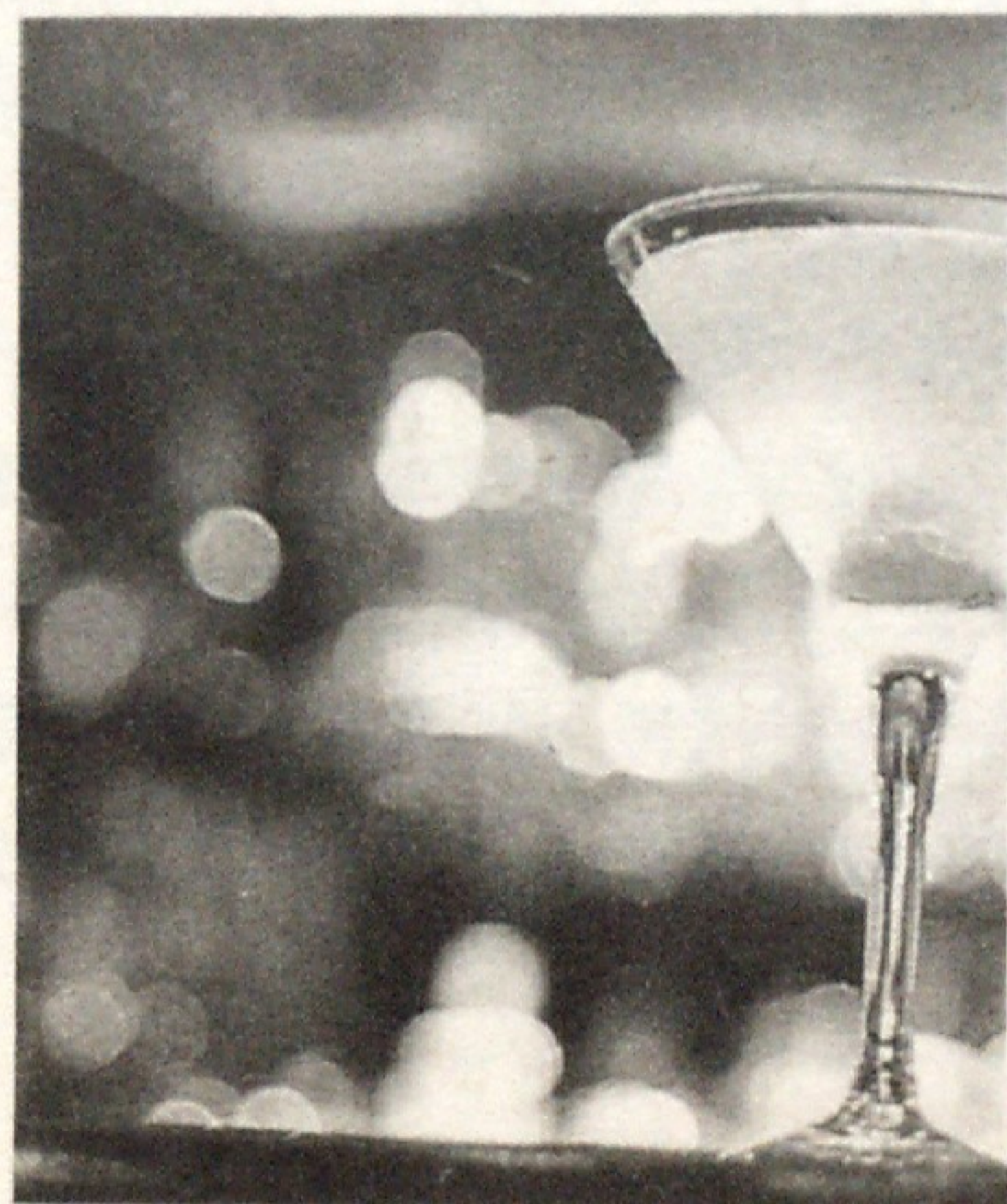


情，帶領我們進入神聖的祭典，激動我們的感性、以及集體的抑鬱，我們在愛恨的當面，如同遊戲一般帶著認真。

我是在其中一次又一次的堅強起來，知道了「鬥爭」終究只是代表一個「對立」的概念，大部分是用來針對「改變對立面的積極過程」；我終於真正懂得什麼是「既是同志又是敵人」的這個「辯證」內功；我終於瞭解自己借用了過去的「詞彙」來解釋一些新的事情，以致於不自覺的接受過去的對世界的靜態看法，並且使得它動態的、發展的面向消失；我理解了百轉千折的過去，這過去是借用政客一般習慣的行為在創造，用他們的思考方式在批判，以至於用著他們的狹窄的胸懷來量度我們自己的世界。

新舊交接，昨日亦未死。而如幼兒的我，身上烙印著祖靈的胎記，有人看到這個封建的記號，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有人憤怒的掐著我的脖子說：為著這個痕跡而反對我的出生，卻沒看到他〔她〕們自己身上存在同樣的標誌；而我不知不覺的塗抹了世紀的顏色想要掩蓋它所承載的恥辱，它卻變得更為矯飾而令人炫目。

困難是在於此，沒有人會問著：為什麼？以便掌握真正解決問題的鑰匙；大多數只著急的要在當下斷論：就是什麼！以便否定問題本身。而正是失去了歷史的視野，那靜態而實証的數學思考方式，才會安靜巧妙的與生活相連接；生活若是泥



沼，思考就成了漿糊；想法如果僵固，日子就只有規定的格式。而我的格式中只有天天無聊的葷笑話、唱KTV、酒精、三國志、麻將以及周星馳。我該如何描寫這些枯燥沿襲而不是豐富創造的日子？

彷彿只是記得每次遊行都令自己乏味，震響聒噪的麥克風，自己在指揮車上說著彷彿三級片煽情的演講內容，不斷重複著的口號，以及沒有臉孔的勇敢台灣人民的規格化歡呼聲；我只是記得KTV一唱再唱的「放浪人生」與「酒後的心聲」，不知道是低能或叫做風花雪月的螢幕影像，有一句沒一句搭著的笑話，以及一群瞪著螢幕而在臉上幻出奇妙色彩的男女同志們；我的生活就只是空空蕩蕩的娛樂，我事實上活在被規定的生活泥沼中。

如此生活的習性消磨了我的思考的敏銳度、自我的要求與紀律，生活竟成了虛無的布爾喬亞。高尚的咖啡廳裡的社會主義與學運路線的論辯，KTV中的組織合作，永遠的遲到習性交織了運動的日子。而生活總是不知不覺的來來去去，當有一天走到錄影帶店面前，我發覺自己竟然懶惰到只想租好萊塢的電影。我已經習慣主流社會的節奏了，它的語言，它的情感表達了，我驚覺自己對事物感受力與批判力的腐化。猛一回頭，正發現我是如此之快的凋逝，我的運動是異化了。

間或我會覺得葷笑話裡對性器官的刺激性的描述與侮辱，會使許多女同志不堪，但是太習以為常了，以至於變成了如同野獸一般的反射動作。但是我是要求「人類解放」的，是不是在關於「性」的言談的百無禁忌以及身體力行就是「解放」？喝酒後的恣意放浪、豪賭著的麻將、花了三天三夜來統一中國……一些無所為的行動就叫「解放」？我覺得困惑，



卻總是沒有解答。彷彿是我自己製造了一個偌大的網羅，設想有一種「解放」的樣子，以便改變自己去符合想像中的「解放」的笑容、表情、言談與性關係，去符合「解放」的種種規定；事情卻又是相反，我沒有打開社會的枷鎖而獲得解放，反而進入了自己所規定的「解放」的枷鎖。

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我所抗爭的世情卻成了自己的所有，這個弔詭的情事緊鎖了我的心靈，狂歡後總是令人覺得內在的虛空，只是我也無力破碎這個虛空……。

而在這個無盡虛空中，我無能從批判舊日被約制的生活出發，以便真正「擁有」解放的踏實，卻活在自我幻想的解放圖像與歷史的牢籠裡，「佔有」著虛無。

二十二歲了，按著社會常理是大人了，誰還會不斷的訓誡我、批判我？我享受著學運的大小風波的回憶，佔有詮釋經驗的印信，如同父親一般的照料、擔心著「學弟妹」的情緒，甚至常常嚴詞以對，我又要如何學會在「學弟妹」面前低頭認

錯？

當舊日的戰友逐一散到四處，我要面對學生生涯的結束，這不禁令人感傷落淚。在短短幾年中我們創造了一種貌似全新的生活方式與遊戲規則，並在其中活著，以為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我們在緊繃的運動壓力下，難受的學習著如何對待同志與自己，學習著如何過集體的生活，創造一種新的文化生命。只是我的創造斑雜著死人的幽魂而呈現令人不堪的回想。而至此我才體會「生活」是什麼，「運動」是什麼。我是太偏狹的展開急功近利的權謀遊戲，看不到更大的世界，反而加強既有的文化結構，以至於成為敵人的一員，所不同的只是他們吃了大餅，我撿了屑碎而已；我只片面的學會了政客的鬥爭伎倆，然而我的生活卻沒有全面的於此同時成長。我在這個布爾喬亞的國度中，用他們的格式說明了自己的愛恨，用形式創造內容，乃至於用父權來要求解放。我過往的生活其實與整個社會如出一轍，只有「人類解放」這個標語在眼前懸垂舞飛……。

在這個用三國志、咖啡廳、黃色笑話、KTV、酒精、麻將、三溫暖以及教條堆起的運動的墳場，我要用力埋葬自己過去的生活。

然而我又想到那些朋友們畢業後的日子。我們都要向年老的父母交代，甚或負起養老家的重任；都要像一個大人般取得社會認可的，又不枉費多年高等教育的職業，大部分是進入大公司成為社會的中堅；我們都要像一般人一樣獲得安定的家庭與乾淨的住家，還有好開一點的車子；我們會漸漸為了社會所認定的生活奔忙。我想起了那麼多的朋友一個接著一個的結婚，家庭的重擔、貸款的壓力緊跟著襲

來。我看到了那些昔日的學運老將一個一個被社會吞沒，只能偶爾分潤記者筆下那些政客分分合合丑戲般的花邊新聞；此刻我的心情紊亂難理。

我們終要面對漫長生命裡生活方式的選擇。

生活就是文化，它正向毒素一般滲入我們自己細胞深處。政客們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還知道推動所謂「新生活運動」，然而我們的朋友，卻連反省生活這一點的眼光都沒有，甚至還把自己的生活文化與思考方式，在言談中推到了笑話的領域，在思考上排除到「私」的範疇，在鬥爭中片面的化約為敵人的耳語，以便將它隱藏在黑暗的角落，規避著批判。其實我真的害怕有一天自己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面前感嘆著舊日時光，面對自己的腐敗而毫無警覺，害怕我再回到這個年代久遠的墳上，卻依然徬徨落淚。

人民是野百合的土壤
運動是野百合的生命

而 來稿、捐錢
則是野百合通訊的糧食！

郵撥帳號：21190623

劉茂彬

關於新黨的一些思考

葛東西

台北政治圈的權力競逐遊戲總是熱鬧紛紛。在台灣悶熱的八月天裡，九十九歲高齡的國民黨，黨官們正在使勁渾身解數地，想要讓這隻老狗能夠變出一些新把戲，十四全正代表了他們衷心的荒謬期望。然而，在新戲上檔之前，國民黨內的“少數異議份子”卻提前推出了一齣小成本製作的單元劇，搶盡了國民黨十四全大戲的光彩。八月十日所推出的這齣戲，如果趙少康等人足夠幽默的話，或許可以稱它為「親愛的李主席，我把新連線變成新黨了」。

新黨的成立，無疑地將會對台灣當前的政治生態造成不小的影響，關於這些分析，我們在連日的報刊上已經看到太多了。但是這些分析，基本上都是從政治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切入；所談論的不外乎是新黨成立後對於國民黨及民進黨兩黨的影響，尤其大家所熱衷的是，新黨的成立對於年底縣市長選舉所造成的直接效果。這些分析的確是具有其意義與新聞性，同時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直接的反應。但是總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我們缺乏了一個從社會階級角度出發的分析。因此，我在這篇文字中，便試圖自社會階級的面向來對這個政治事件作一些小小的思考。

新黨是當前台灣所存在的政黨中，繼勞動黨後，唯一明確將自身定位為階級政黨屬性的一個政黨。但與勞動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不同的是，新黨宣稱他們所代表的將是“小市民”、“小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何又謂小市民或是小老百姓呢？在新黨成立前的一篇報導中，我們看到新黨將其所訴求的群眾，大概定位在於中下層經理人員、公教人員、專業工作人員、中小企業主，以及某種的藍領工人（如電腦操作員）等。從新黨如此的自我定位，我們可以看出，新黨的階級屬性便是代表所謂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說，新黨乃是作為介於資產階級與藍領工人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

然而，無論是代表小資產階級也好，或是代表資產階級也好，作為階級政黨的新黨，其目的絕對不是在於透過政黨的活動而推動發展屬於某個社會“弱勢”階級的社會運動。對於政党的目的而言，這是極可以理解的（或許勞動黨是個例外）。新黨的目的仍是在於選舉的勝利，雖然就短期而言，這個勝利所指的並不是執政，而是有影響力的少數。但是，問題是，新黨的選民在那裡？

當然，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眷村中的外省第二代，甚至部份的第一代，將是新黨重要的吸引對象。但是，除了外省族群之外，新黨仍舊是有可能將其支持範圍擴及到這個族群之外的。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在這幾年已逐漸呈現了惡質化的現象。隨著國民黨的“本土化”取向，地方派系、財團的勢力已經堂而皇之的進入了中央國家之中。因為國民黨歷來與地方派系的糾葛關係，加上地方派系所賴以起家的土地炒作、承包工程等等惡行，以及近幾年來經濟成長的緩慢，使得一般的受薪階層對於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現狀產生了不滿。因此，新黨便企圖將這些人設定為其吸引的範圍，從新黨的成立宣言便可以明顯的看出他們的企圖。然而，這個選票市場卻也很明顯的與民進黨有所重疊，因此，新黨的區隔方式便是強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可能對台灣所造成的災難，同時淡化其反台獨與急統的立場，再進一步的將其吸引對象自民進黨的群眾中隔離出來，形成一個特定（雖然可能不大）的政見消費群。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新黨所揭櫫的是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政黨，而把工人階級自其吸引對象中劃分出來。但是，隨著民進黨在選舉中的節節勝利，在政策制定上的影響範圍日增，資產階級必定也會展開其與民進黨更為密切的合作關係。在這個可能的發展趨勢下，原本民進黨的重要支持基礎，工人階級，是否可能部份會轉向支持新黨，或是新黨會再進一步的將自身定位重新調整以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進而形成工人、小資產階級的階級聯盟，以對抗由資產階級所壟斷的、惡質化的資本主義政治形式的群眾主義式的運動，這將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未來動向（不過，在這裡要加上但書的是，這個可能的趨勢仍要視未來階級意識與所謂台灣本土意識的發展方向這兩大變數而定）。而且，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歷史也曾揭示了這個類似的發展趨勢。也就是，作為一個階級政黨，在決定投入選舉並歷經不斷的選舉過程後，他也必須不斷的調整自身的屬性，以求得選舉的勝利。換句話說，如果新黨在未來若能夠穩定的生存下來，那麼它也非常可能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否繼續維持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政黨屬性。

雖然，新黨的成立，在現階段台灣惡質的資本主義政治文化下相對而言是一股“清流”；但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性格，卻使現階段標示著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新黨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無論如何，由於新黨的成立，未來必然會加劇選舉活動在台灣社會的重要性。這使得社會草根組織基礎原本就極為薄弱的台灣社會，必然也會因此造成社會力與社會資源加速的流向政治層面，進一步的增加了設立並穩固獨立自主運作的社會運動組織與社會草根組織的困難。對於從事社會改造的同志而言，這將是一個必須正視與面對的問題。

划向自治之孤舟

雅美族行動的啟示

戴伯芬



3月25日，20餘位身著傳統戰袍的蘭嶼雅美人遠渡重洋，來到台灣民意最高機關——立法院，參與「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權益公聽會」，這場被喻為「與雅美人共舞」的聽證會不僅喚起了大眾對於這個偏處一隅的熱帶小島之關懷，延緩了營建署粗暴的觀光版國家公園計劃，也激勵了本島其他原住民的行動意識，引爆了國際原住民年對於原住民權益的討論熱潮。

蘭嶼雅美族這次反國家公園的集體行動有兩層重要的涵意。首先，這是一次自發性的民族自決行動，展現了雅美族群的社區自主意識，以及面對生存危機的行動力，誠如立法委員葉菊蘭所說的，這不是一般民衆的普通請願活動，而是「民族生存的自救行動」。其次，這次公聽會的溝通方式，配合媒體的宣傳與報導，成功地建立了一次原住民集體行動的範例，也打破了街頭運動的瓶頸，隨後，泰雅、布農的原住民也展開族群的抗爭行動。

1. 自發性的民族自決行動

雅美族這次反對國家公園設立的行動其實是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結果。從1980年起，雅美人對於政府在島上的種種行政措施，就提

出過抗議的行動。稍早，是針對政府侵犯其土地權屬之抗議，包括對退輔會徵用土地、牛隻踐踏田地之抗議、環島公路拓寬與土地徵收的衝突，自來水處侵佔水權之爭議，雅美族對於各聚落內的私有土地權，以及公共空間的使用決策，一直保有相當高的社區自主意識，也透過實際行動來表達意見；1985年以後，抗爭的焦點逐漸集中於反核的議題上，對於這個現代科技殘餘的巨物，在未經居民同意而進入盤據於島南的禁忌地點，雅美族人有著極度的恐懼與憤怒，沒有任何雅美語彙可以用來形容「核能場」，老人只能在年輕人的語義解釋中輾轉想像其意含。1988及1991的反核行動，激發全島居民集體動員，來表達他們對於自己土地的關懷，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族群的意識慢慢凝聚（以往雅美族有的是部落的社區意識，而不是跨部落的族群意識），也培養了雅美人行動的能力。

325的行動也不是一夕即成，在此之前，島上居民已經在各部落召開座談會（1991年9月），表達他們對於國家公園的看法，各村針對營建署的方案熱烈地討論後，反國家公園已逐漸在島上凝聚成共識。座談會中居民十分生活化，暢所欲言地以母語表達個別意見，這些意見包括國家公園的設立，也涵蓋了蘭嶼島上的其他問題，諸如觀光、國宅、核廢料等問題，包含對於政府行政部門的質疑，也包含對於部落內部的反省，以下是一些雅美居民的意見：

「國家公園不是祖先留下來的，我們不需要。」

（漁人部落）

「我主張不要國家公園，觀光客愈多困擾愈多。」

（漁人部落）

「以目前觀光人數來看，設立後會有多的污染。」

（紅頭部落）

「我們無法控制觀光客心態，可能變成國家動物園。」

（紅頭部落）

「所有老人均不歡迎國家公園，年輕人沒有土地，沒有權利說何意見，若不堅持、團結，我們將失去土地。」

（野銀部落）

「有些年輕人說老人是死頭腦。」

(野銀部落)

「觀光對我沒有影響，我沒有伸手討煙。」

(野銀部落)

「有時鄉公所發單子請我們蓋章，老人糊裡糊塗就被騙。」

(野銀部落)

「我們承認政府有權控制人民，但否認政府能控制我們的土地，政府能再給我們一塊和蘭嶼一樣的土地嗎？如果不行就不要來搶我們的地！如果他們強迫佔據蘭嶼的地，則是暴動的起源！」

(東清部落)

「我們應該用性命來抵擋國家公園的到來」

(東清部落)

「利用這次機會一併處理核廢場。」

(東清部落)

「蘭嶼有些民代也加入爭取國家公園的行列，竟背道而馳，真是雅美人的恥辱。」

(朗島部落)

「據聞目前僅兩人同志，其餘全部反對，這二人不會贏我們。」

(朗島部落)

「因儲存場的受騙事件，我們對政府的施政及任何承諾，都無法相信，若政府欲表達誠意，應先遷移核廢場之後再進行其他計劃，否則任何工作均會受阻。」

(椰油部落)

「蘭嶼的年輕人，心在台灣，與這塊土地沒感情，很容易被華麗的報導所吸引，放棄自己的土地。」

(椰油部落)

由這些討論的內容可以看出，反國家公園是經過島內傳統的溝通形式而逐漸凝聚起反對的力量。傳統雅美社會是一個沒有領袖的均權社會，透過面對面的民主討論方式，每個人都有權來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討論，決定部落的公共事務。這以325的行動背後是循著雅美傳統民主平均的精神而進行，各村推選代表，來表達他們集體的意見，也就是這樣的精神，使得經濟拮据的雅美人仍挨家挨戶地共出昂貴的機票交通費，到台北來表達他們的訴求與心聲，更從根顛覆了台灣在蘭嶼那一套不合民情的官僚行政體制。

在這一次行動之後，雅美年輕人也拾回了民族自信心，特別是當天參與聽證會的旅台蘭青，他們也加入了反國家公園行動，希望用不同方式來建設蘭嶼。

2. 新的集體行動模式

以往蘭嶼居民，以及台灣的其他原住民也曾經參與不同的反對運動，包括在部落內的反對運動，甚至走上街頭，向國家提出抗議與訴求（如還我土地運動），也達成不同程度的回應與效果。九〇年代開始，隨著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街頭運動逐漸走向瓶頸，各運動團體紛紛改採取比較溫和理性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與訴求。雅美族這次的行動，不僅爭取到決策的立法單位之支持，適時凍結國家公園的預算經費，也由於媒體的宣傳與造勢，再次喚醒大眾對原住民，偏遠地區的關注。

這次的行動以公聽會的形式進行，參與者包括：立法委員，國家公園行政機關代表、專家學者，雅美人，以及其他的社團，各方面的代表都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特別是雅美老人，以母語表達他們的憤怨與反對，再透過翻譯讓在場者都能感受他們親身的生活體驗，表情、肢體語言豐富的雅美老人也成為媒體的焦點。

這次蘭嶼雅美族的行動雖然已經落幕，但更多的原住民行動將在今年國際原住民年陸續上演，蘭嶼的經驗正足提供一個啟示：只有立基於社區的草根行動，才有改變自己命運的可能！

爽與不爽

這裡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就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Marx，《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關於一本學運史新書

和一場未竟的討論

周奕成

現在，這樣一個運動組織漸漸衰弱，理論的辯論更早已消沈的時刻，台灣的學生運動需要這樣的一部“史”麼？而我們，思考學運出路的人（假定是的話），又確乎有必要集人精神來評論任何一本“學運史”麼？

對於仍在校園中埋頭苦幹的年輕學運幹部來說，或許每一個時刻，都不是學運該修史的時刻，因為反省與開創從不斷續地在進行，明天總是有新的可能性。誰需要這樣一本學運史？是此間熱衷於政治窺視的新聞媒體？是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的資料室？是“對整個八〇年代學運有更完整的圖像”的“社會大眾”（註一）？還是沈緬於昔日浪漫榮光，卻又企圖影響未來的學運前輩們？

學運史，由此不只是“史”，而是一組“論述”，“…跟『論述』密切相關的是『詮釋權的爭逐』，…本身即是一種權力鬥爭，有濃厚的政治意涵，這類文獻應該把它視為運動的原始文獻，因為它跟運動時的文宣品有同樣的地位，只是包裝得…”（註二）。這段文字雖是濫引，亦非鄧丕雲兄編撰〈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的動機，但是客觀作用是在人的動機之外的。

設若如此，則我們該討論的是學運的“觀點”問題，而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的“史實”罷。至於眷戀於“考古”、“更正啓事”的喋喋不休者（有如國民黨遺老在〈傳記文學〉所做之類），是另外一個問題。

有一種觀點，是所謂台大學運的主流

所一貫倡言的，亦是一般新聞媒體的學運評論所採取的（註三），在〈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書中，及該書發表會和會後非正式的徹夜談論中，貫穿為一個基調，一種問題意識。我們姑且將之化約地稱為“台大觀點”，並且更化約（但不歪曲）地描述如下：學運是不該分裂的。但是學運分裂了。學運分裂為台大系統和民／全學聯系統。這樣的分裂是長期無數的摩擦造成的。以“五四衝突事件”等為肇因。衝突主要來自心理因素、人際關係，而非意識形態與路線問題。雙方在意識形態上沒有明顯的差距。往後的種種以迄全學聯的過程，仍是此種衝突的延續。既非根本上意識形態的差距，學運應該或最好能整合。透過對話，澄清以往的誤會。

這樣的“台大觀點”，早已是學運圈乃至反對運動陣營、輿論新聞界所熟悉的論調。在書中，鄧丕雲再以各種方式表達此一觀點，而新書發表會後的討論中，包括林佳龍、范雲等台大學運領導者也堅持此種觀點而激烈論辯。且不論其與「事實」不符，這種觀點，造成了新聞媒體與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學運份子耽溺於權力鬥爭的表面印象，及校園學生群眾對學運組織的反應；而將學運“分裂”只歸因於幾位前輩的摩擦，彷彿“一言不和，林佳龍和曾昭明各自將人馬帶開，從此…”這不僅是學運前輩某些衝突當事人的自我膨脹和英雄主義，更不知將其後這麼多年來，各個校園中，思辨、實踐學運路線的青年學生們的人格、智能、心血

和努力置於何地！

但是我們要批判的重點，還不在於用這種適得其反的方式來整合學運之謬誤，而是在於“台大觀點”採取了微觀的，行動面的視角，為台灣學運的跨校組織問題下了片面的斷言。因為只用心理歸因，不做政治主張、意識形態的考察，所以只能看到派系鬥爭，看不到路線歧異。因為只用權力途徑，不做歷史的、結構性的觀照，所以只能理解線性因果，而不能理解各種因素的辯證關係。

很顯然的，人們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而理解方式這樣的截然不同，豈不正表現出其間差異的重大？民／全學聯的學運成員，以意識形態不同，來解釋學運路線的歧異，這是建立在其一定的社會分析之上。而上述“台大觀點”的持有者，則得出“大家本來沒什麼差異，過去都是誤會一場”的結論，真是“自由多元主義”得很（四）

台灣學運並沒有分裂，從而亦毋須整合。台灣和全世界各國大致一樣，都擁有兩種以上路線的學生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這些不同路線的學生運動，分別以不同的智識傳統為基礎，有的是自由多元主義，有的是馬克思主義各流派。各種智識傳統或意識形態，各有其相對應的世界觀、社會分析，乃至於具體的政治主張和組織形態、運作模式。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在八〇年代的台灣校園中，各自發芽滋長在適合它們的土壤，吸引了部份的知識青年，並促之以行動號召（這樣的過程值得再探討，但不是本文的問題）。即使在台灣的特殊時空背景下，一切事物都是

混淆的，然而歷經摸索與試探，學運的出路已經不再那麼模糊。學運路線的矛盾，乃是來自於根本相對抗的智識傳統。自由多元主義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傳統，能否或如何結合，是另外的龐大課題，但是硬要抹煞這些重大矛盾，意欲在學運組織中營造團結，毋寧是不必要的。

如此看來，學運路線的歧異是必然的，即令不發生在彼時彼人，也會發生在此事此地。用任何一件個別事件來解釋學運的“分裂”，無非是穿鑿附會罷了。學運需要的是對話，而非掩蓋差異；是結盟合作，而非大團圓。

更進一步應該指出的是，台灣學生運動所急需的，是未來三年發展的理論，而不是過去十三年累積的史料。這一波關於學運史的討論，若能使同志們都徹底厭倦了以往是是非非的糾纏不清，則未嘗不是大功德乙椿。而九〇年代的台灣學生運動所要面臨的新的內外局勢，是嶄新而充滿變化的。每一個期望學生能改造社會的人，都必須全神貫注於校園內的新人類，社運人的新議題……。相形之下，這關於一本新書和一場未竟的討論……等等，應該儘早結束。

註一：引自鄧丕雲著，〈台灣八〇年化學生運動史〉，自序頁二。

註二：前揭書，頁二七二。

註三：最近的典型例子是〈新新聞〉周刊第 期頁九二〈兒〉文，粗暴而濫情地混雜這個觀點。

註四：台大學運朋友們常踴躍參與民進黨的黨內鬥爭，不知又該如何解釋新潮流、美麗島的差異？

有人開了一間帽子店

回應致平「有人問我一個公平正義的問題」

侯念祖

我在去年的《野百合通訊》第一期上寫了篇“5300”字（感謝致平費心的計算）的評論文字。在這篇評論中，我試圖以階級分析的方式，對於去年（八十一年）喧騰一時的所謂「二次土改」進行討論與分析。而後在《野百合通訊》的第三期上，出現了一篇致平對於我那篇評論的「討論與商榷」的文字（以下簡稱林文）。在林文中，表現出了對於我那篇文字的不正確的理解，同時也正確的表現出了他自己的政治偏見。以下，我將試圖指出林文中的問題，並對於林文對我的誤解作必要的抗辯。剽句致平的話，這也「並不是什麼批判鬥爭或派系鬭牆的文章，望朋友與敵人明鑑」。

製造業的道德性：別讓我哭笑不得

首先，我想先對於在致平的文章中，所出現的一個對我還蠻嚴重的誤解作些說明。

我在第一篇的文字中，曾經提到了製造業資本與土地資本在理論上的矛盾性。但是，我也試圖分析指出了，為什麼在現階段的台灣，製造業資本與土地資本並未有明顯的衝突，因此在土增稅方案的鬥爭中，王建煊並未獲得來自於製造業資本的支持。

誠然，我認為王建煊的方案具有「相對的進步性」，同時，我也認為，就價值的創造而言，製造業資本比起土地資本更有其貢獻與重要性。但是，要注意的是，這並不能導出致平所說的（嚴格說起來是，致平所說的認為我所說的）：李登輝／土地財團V.S.王建煊／製造業資本，以及，我會天真的認為製造業具有道德上的高尚性格。

雖然橫遭此誤解，我還是不必忌諱的指出，製造業比起連骨頭帶血肉一併吞下的土地資本具有其進步性。因為前者才是價值創造的來源，可是後者卻以逸待勞的剝削了人類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卻對於價值的創造一點貢獻也沒有。別忘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是在於人類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上，資本主義（當然指的是工業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是具有其進步意涵的，而剝削的關鍵只是在於所有權與由此而來的價值分配的問題。

但是，如果這樣就認為我絕對的支持製造業資本，或是認為製造業具有道德上的高尚性格，那麼，我也只能怪罪於在致平的腦中有一種神奇的酵素起著神奇的作用了（或是最近台北天氣太熱了）。

我當然不會不知道製造業資本對於工農的剝削以及對於環境的破壞等等的罪惡，同時，在我的文字中也從來沒有對於製造資本高聲的歌功頌德（我實在很納悶致平是如何閱讀的，想不通），我的立論是相對於土地資本而發的。但是，如果脫離了這個比較的脈絡，而認為我賦與了製造業資本道德上的正當性與進步性，甚至勸告似地對我說「不應輕易如此，否則充其量只是一個稱職的資產階級的旗手罷了」，那麼這其中牽涉到的恐怕是眼力與智力的問題了吧。

李登輝作為分類的判準？

在我的第一篇文字中，直指李登輝乃是作為大土地資本利益的代言人，並反駁其遮遮掩掩地拉出小地主、農民以及擁有祖產者作為掩飾的說法。當然，我也指明了王建煊的方案（縱使不是真正的土地改革）具有「相對的進步性」。同時，我也指出，在這場鬥爭當中，由於製造業資產階級的缺席——重要的是，在當前台灣的產業投資環境下，他們的利益與土地資產階級並無二致，因此使得王建煊缺乏有力的支持，而導致其政策的失敗與他的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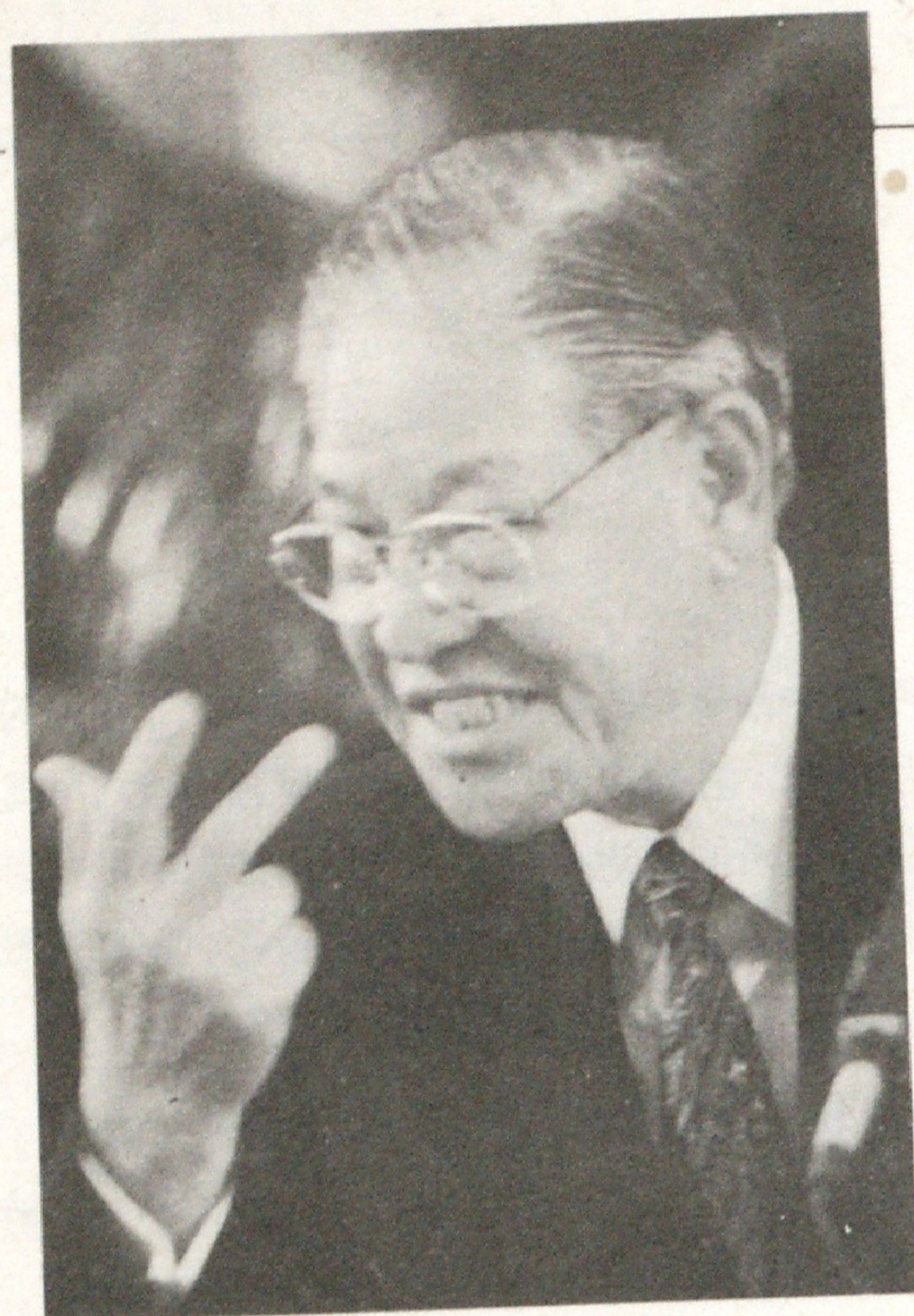
然而，我如此的對於所謂二次土改革的分析（不論正確與否），令人傷心難過地，竟被致平理解為在政治鬥爭中「選擇靠邊站」的問題——標榜公平正義的王建煊或是明顯代表土地資本利益的李登輝的二選一。換句話說，致平要我留意的大概是（在我看

來，這也是致平文中最重要的結論）：不要被「保守派」的美麗公平外衣所欺騙，因為，在歷史的經驗中，人民總是被利用為奪取政治權力的工具，一旦新的統治者在各方角逐的勢力中脫穎而出時，人民還是最後的犧牲者。對於致平的憂心與勸告，我可以體會與瞭解。但是，致平的憂心勸告好像有點搞錯了對象。

或許是由於我在文中表現出了對於李登輝的「厭惡」（致平語）以及對於王建煊的「具有相對進步性」的評價，使得致平有如上的勸告。但是，我必須指出的是，我對於李登輝的批判，絕對不代表我對於王建煊的接受，這一點只要是不管天氣如何炎熱而認真的閱讀過我的那篇文字的人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就算王建煊的政策具有我認為的相對的進步性，但是我也從來沒有希冀「人民」支持王建煊，或對於他有著任何的幻想。然而，致平不但以一種奇妙的閱讀方式誤解了我的原意，而且還額外的拉入了新國民黨連線作為批判的對象。致平在文中毫不猶豫的將王建煊歸納入所謂的「泛非主流派」，同時下筆不能自休地將新國民黨連線（尤其是趙少康）修理了一番。對於這種分類分派的方式，我覺得實在值得檢討。

或許王建煊在土增稅一事上與李登輝是南轅北轍互有矛盾的，但是，若是輕易的將他歸入非主流派則可能犯了相當嚴重的錯誤，同時，也會使得分析與評估變得不精確。因為，在所謂的非主流派當中，事實上存在著相當大的歧異性。由最近的發展來看，更是如此。

一方面，王建煊與新國民黨連線之間的關係是模糊不明的，而且，另一方面，新國民黨連線與國民黨內保守的外省籍大老（如郝柏村、梁肅戎等人）之間的利益關係也並非如此一致（還記得趙少康也是反對郝柏村組閣的一份子吧）。從表面上看來，他們同樣是反李登輝的（要注意的是，王建煊在反李的立場上並非十分明顯，倒是李登輝常常反王），但是，卻有相當不同的利益點與手法。就外省籍的國民黨大老而言，反李是為確保在國民黨內的既得利益



與權力位置；但是，就新國民黨連線而言，雖然他們同樣的在黨內的生存空間也遭受到了李登輝的打壓，但是，由於他們作為一群民代的組合，他們的權力來源相對於保守大老而言，較不是源出於國民黨內的妥協與分贓，而是來自於選舉中的選票（或虛幻的所謂民意）。因此，他們的反李（或反主流），是爲了在政治言論市場上與所謂的主流派有所區隔，因而得以吸引某些特定的選民。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就連在新國民黨連線內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例如，郁慕明的軍方及保守色彩最爲鮮明，而趙少康在這方面卻完全與郁相異。因此，就連較具團結形式的新國民黨連線其未來的分分合合事實上也是在未定之天的。如果，我們將這麼異質的一群人只因爲他們反李登輝就輕易的歸爲一類，那麼，形式將會掩蓋住實質。其實，這種分類法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我們再來看看致平的這幾段話，這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的瞭解致平的腦部結構。在致平談到台灣的大資本發跡的過程時，他說：「傳統的製造業中從大陸遷台者自然又是一個執政者眼中關愛的對象。」，「設若土地租稅真照王建煊提案實施，真正受惠者還

在於與地方、中央行政體系關係良好的財團！這裡面當然包括了許多傳統製造業。」，以及「所有可能的受害者，就應該是那些平時較少受到國民黨的關愛的本土企業和中下階級了。」

大哉斯言！

從致平以上幾段令人感歎的話當中，我認爲，若不是致平對於台灣的發展過程與經驗所學有所偏差——基本上，我是排除這種可能性的；那麼，可能就是他的論述有其偏見作祟。也就是，他因爲驗光師的錯誤而戴上了令人暈眩的眼鏡來看歷史，於是，導致了他誤認爲外省資本是政治下的唯一特權受惠者。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藉由對歷史事實的觀照而反駁致平的這種說法。如果，在早期，國家只照顧到了外省資本（政治考慮下的特權受惠者），那麼，王永慶、辜振甫、吳三連等人（族繁不及備載）這些在台灣呼風喚雨的資本家們，就是白手起家（或說黑手變頭家）、完全依賴自己的能力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成功典型了嗎？我相信，沒有任何人會聰明到如此認爲吧！

不過，從這幾段話中，我們終於知道了，原來在致平的腦袋中省籍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因素，其程度重要到歷史都可以因此而重新改寫。其迂迴的過程實在不亞於給我報報雞金會的阿丁探案。

最後……

當然，致平的這篇文章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的。我想說的是，我贊成致平所說的：「沒有伴隨著屬於草根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擴展及民主組織的建立而來的社會改革，是口惠實不至的社會改革。」但是，如果致平念茲在茲的是國家的性質問題（社會資源如何分配，其利益與意圖爲何，用我的話說，即是國家所代表的社會階級關係及其展現），以及如何進行民主改造、社會改造的問題，那麼，就請致平能稍微的加以注意李登輝這號唯國家中心的危險人物，以及一切其他具有如此性格與傾向的黨派和政客們吧！

編輯手記

讓大夥久等了！一方面是抱歉，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種期許吧！野百合通訊能真正成為一個大夥期待而久等的刊物。

這一期，比較沒有一個特定的專題。既然為通訊，也很難大家“互通訊息”的均恰好針對特定的專題。不過，互通訊息、經驗分享、本來就是這本刊物所想要提供的最基本的功能。

在這樣的想法下，擺在最頭前的兩篇文章：校園、學生自治與運動及有關東吳313事件的反省，除了是校園中第一戰線朋友的實戰心得，更突顯九〇年代台灣校園環境的新變局——高學費政策、及新思考面向——學生會的切入。

而同時，漫漫長夜暑假剛結束，而放假中學運的朋友們也不是閒着，無不利用學校這部教育機器暫停的放封時間，大勢活動筋骨。〈暑期營隊報導〉正想提供眾多不同營隊的一些交流。畢竟，營隊結束的後序發展是遠遠比營隊過程重要的。

過去一年來，現在的新黨及之前新K的這批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演出，手法不斷翻新，場景亦不時變換。有人認為不過曇花一現，亦有人有不同之看法。葛東西對新黨的思考尚盼能拋磚引玉，未來能有更多對當下政治社會的分析文章。而其好朋友侯念祖有關帽子店一文，則是延續前二期的辯論。

特別感謝戴伯芬的賜稿，雅美族作為原住民的一支，其地理即其它客觀條件，使一個社區的、自治的原住民運動的思考，因國家公園這個問題而額外有意義。同時，何東洪亦繼第二期開闢音樂屠場後，又提供了一篇蠻有趣的文章，雖然不是“自己幹”的。

作為編輯，必須要寫編輯手記，而要寫編輯手記自然要閱讀所有文章。因此，總是期望，若大夥將對野百合通訊的讀後，不管是心得、意見、新意，付諸文字，野百合通訊亦將不會讓大夥久等了。